

# 西方有關佛陀與佛教的第一本書

烏爾斯·艾普 (Urs App)

**摘要：**關於全球精神版圖的發現史研究大大落後於對有形世界版圖發現史的研究。歐洲與亞洲最大宗教的邂逅即是一個很好的研究案例。每個孩童都很熟悉哥倫布等歷史人物，而即便是研究佛教的學者也往往不知道那些在西方世界發現佛教的主要人物。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關於西方發現佛教的研究中，西方出版的第一部關於佛教的著作至今幾乎不曾受到關注，這就是 1817 年米歇爾-讓-弗朗索瓦·奧澤雷 (Michael-Jean-Francois Ozeray) 在巴黎出版的《東亞宗教創始者浮屠或佛馱研究》(*Recherches sur Buddou ou Bouddou, instituteur religieux de l'Asie orientale*)。

該文講述和分析了奧澤雷對佛教及其創立者的理解，發掘他所依據的主要資料，並解釋了奧澤雷的書何以為西方對佛教及佛陀的知識作出有益貢獻。奧澤雷著作出版時，立足於大學的佛教和佛教文獻研究處於即將起步的前夕，他的研究主要依賴的是派往亞洲國家的西方大使和僑居在那裡的西方人對藝術品的複製和報告，而不是傳教士的書信、書籍和論辭。雖說奧澤雷的開拓性研究有許多明顯的缺陷，他對奉行於亞洲的佛教的整體視野更契合於現代研究的實地考察，而非大多數當代流行的佛教讀物。

**關鍵詞：**西方發現佛教、佛教接受史、西方佛教研究史、米歇爾-讓-弗朗索瓦·奧澤雷

在這裡，我們將發現我們最早的淵源和大部分的傳統。

奧澤雷 (Ozeray) 《浮屠或佛馱研究》  
(*Recherches sur Buddou ou Bouddou*) 第 32 頁

我注意到，在本次會議上，很少有論文能夠彌合“歐洲對佛教的接受”與“佛教藝術”這兩個主題的分歧。為此，今天我想談談西方佛教接受史上一個鮮為人知的里程碑，來關聯這兩個主題，那就是 1817 年米歇爾-讓-弗朗索瓦·奧澤雷 (Michael-Jean-Francois Ozeray) 在巴黎出版的 *Recherches sur Buddou ou Bouddou, instituteur 'Asie orientale* (《東亞宗教創始者浮屠或佛馱研究》)。該書扉頁醒目地排印了較長的標題，對該書的內容做了圈定：

東亞宗教之師浮屠 (Buddou) 或佛馱 (Bouddou) 研究并序論：  
通論獻給造物主的第一個宗教崇拜，及論日、月、星、天、地、山、  
水、林、人以及動物之崇拜所導致的宗教墮落<sup>1</sup>。

先介紹一下作者奧澤雷。(圖 1)

### 一、作者：米歇爾 - 讓 - 弗朗索瓦·奧澤雷 (1764–1859)

1764 年 11 月 24 日，奧澤雷出生於法國的沙特爾 (Chartres)，1859 年 8 月 4 日逝世于比利時布容 (Bouillon)，享年 95 歲。他家境殷實，主要興趣是歷史，後來成為法國歷史學會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France) 會員，蘭斯學會 (Académie de Reims) 准會員，比利時盧森堡省人類學

---

<sup>1</sup> “Recherches sur Buddou ou Bouddou, instituteur religieux de l'Asie orientale; Précédées de considérations générales sur les premiers hommages rendus au Créateur; sur la corruption de la religion, l'établissement des cultes du soleil, de la lune, des planètes, du ciel, de la terre, des montagnes, des eaux, des forêts, des hommes et des animaux; par Michel-Jean-François Ozeray.” 本文奧澤雷書內引文頁碼以括弧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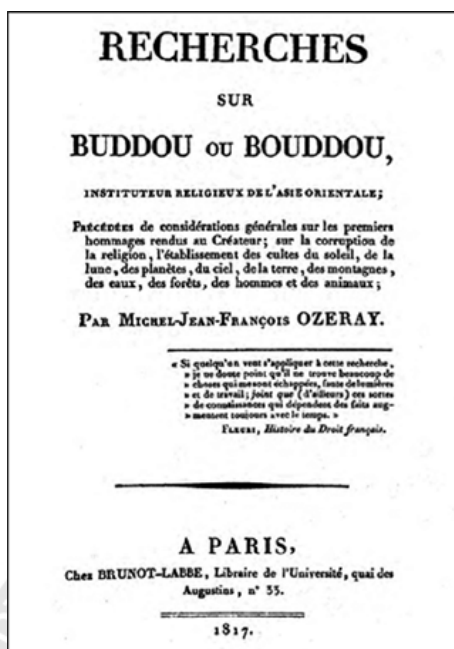


圖 1 奧澤雷《浮屠或佛馱研究》(巴黎, 1917年)扉頁

學會 (Archaeological Societies of the Province of Luxembourg) 及法國厄爾盧瓦爾省 (Eure-et-Loir) 學會的永久會員。1817年他出版了關於佛陀和佛教的著作, 這也是他第一本出版物 (53歲)。大約同時, 他移民比利時, 以便離生病的哥哥更近一些, 同時也是表達對 1815年《巴黎條約》的抗議。後來他出版的著作主要是關於自己家鄉沙特爾和比利時布容市的地方歷史, 布容也是他後半生的家。有關佛陀的著作出版 10年後, 奧澤雷出版了有關布容城堡和小鎮歷史的圖書 (1827, 63歲); 之後 1834–36年 (70–72歲) 出版了有關沙特爾歷史的兩卷本著作。19世紀 40年代, 除了為他自己的沙特爾史 (1843, 79歲) 作辯護的小冊子外, 他還寫了宗教教義史 (1843, 79歲) 和一部正統基督徒之書 (1846, 79歲)。90多歲時, 他仍能大量撰寫歷史論文。1859年, 95歲高齡的奧澤雷去世後, 法國歷史學會的《公報》這樣評價作為會員的他:

據我所知，奧澤雷先生還創作了另外兩部未出版的著作。其中一本的主題和標題擬為：《不同民族以及科學藝術新發現的文學，他們的起源與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The origins and memorable productions in the literature of diverse peoples, and of the discoveries in the sciences and arts*)。奧澤雷先生向本學會提審的另一本書是《高盧人的歷史》(*History of the Gauls*)，本書從最遙遠的時代一直談到法國君主制的設立。除了這些作品外，他還將一些原始文獻交給了歷史委員會<sup>2</sup>。

除了 1987 年出版的關於佛教的開拓性著作外，他其後的作品如下：

1827 年：*Histoire des pays, chateau et ville de Bouillon.* (《布容市的地區、城堡和城市歷史》) Luxembourg: J. Lamort.

1834–1836 年：*Histoire générale, civile et religieuse de la Cité des Carnutes, et du pays Chartrain, vulgairement appelé la Beauce: depuis la première migration des Gaulois jusqu'à l'année de Jésus-Christ 1697, époque de la dernière scission de notre territoire par l'établissement du diocèse de Blois.* 2 vols. (《卡爾尼特人之市，沙特爾市及俗稱博斯之地的通史，民政和宗教：自高盧人第一次遷入到西元 1697 年布洛瓦教區設立而最終確定領土》，兩卷) Chartres: Garnier Fils.

1841 年：*Défense de l'histoire générale, civile et religieuse de la cité des Carnutes et du pays Chartrain et de la discussion juste, franche et modérée sur les critiques de cette histoire, contre les assertions fausses du livre de M. de Santeul sur le trésor de Notre-Dame de Chartres et l'article du Journal de Chartres, du 7 février 1841.* (《1841 年 2 月 7 日，為卡爾特城及沙特爾歷史、宗教文化以及對其歷史公正、坦率、

---

<sup>2</sup>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France*, series 2, vol. 2 (1859–1860): 323–324.

溫和的討論的辯護；反對 M. 桑托爾書中有關沙特爾聖母主教堂寶藏和〈沙特爾日報〉的錯誤論斷》) Sedan: Laroche-Jacob.

1842 年 : *Coup-d'œil sur les archives de l'ancien chapitre de la cathédrale de Chartres, et sur le livre intitulé: trésor de Notre-Dame de Chartres.* (《略覽沙特爾聖母教堂舊章的檔案以及名為〈沙特爾聖母教堂的寶藏〉一書》) Sedan: Laroche-Jacob.

1843 年 : *Histoire des doctrines religieuses, ou 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et morales sur la théologie naturelle qui résulte de l'étude de la géologie et des créations antérieures à celles de l'homme et sur tous les cultes rendus à la divinité.* (《宗教教義的歷史，即對人類所有原始崇拜到神學之前的自然神學的哲學和道德研究》) Paris: Hivert.

1846 年 : *De l'origine et des progrès du Christianisme orthodoxe, depuis la predication de Jésus-Christ jusqu'à la mort de Théodose le Grand.* (《基督教正統學說的起源和發展：從耶穌基督的宣道到狄奧多西大帝之死》) Bruxelles: Société typographique Belge.

1847 年 : *Opuscules sur l'histoire de l'ancien duché de Bouillon et sur celle de la cité des Carnutes et du pays Chartrain auxquels est jointe la lettre de M. Abel Rémusat, secrétaire de la Société asiatique, écrite à l'auteur relativement à ses recherches sur Buddou (Boudda), instituteur religieux de l'Asie orientale.* (《有關前布容公國(即卡特爾市)及沙特爾地區歷史的論述，附有亞洲學會秘書雷穆沙先生寫給作者有關研究東亞宗教之師浮屠[佛陀]的信件》) Sedan: Laroche-Jacob.

1855 年 : *Coup d'œil sur la religion en France pendant le régime féodal dans toute sa force, et enfin détruit par l'esprit monarchique, ou pendant les siècles les plus mémorables du Moyen-âge.* (《法國宗教略覽，從其

封建政權全盛時期到最後被君主精神摧毀 [即中世紀最令人難忘的幾個世紀 ]》) Sedan: Laroche-Jacob.

1856 年 : *Précis sur l'Histoire de l'Eglise de Notre-Dame de Chartres, depuis son origine jusqu'à nos jours.* (《準確了解沙特爾聖母教堂的歷史 : 從起源到今日》) Sedan: Laroche-Jacob.

1864 年 : *Histoire de la ville et du duché de Bouillon.* 2 vols. (《布容公國及城市的歷史》兩卷) Bruxelles: Van Trigt.

在奧澤雷的訃告中,其獨子的朋友盧 (Roux)<sup>3</sup> 提到奧澤雷有“很多”未發表的手稿<sup>4</sup>。還說幾乎所有手稿“都一式兩份,保存在沙特爾,查特頓 (Chateaudun) 和神學院的公共圖書館”<sup>5</sup>。這批未發表的手稿清單裡包含名為《佛教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u Bouddhisme*) 的手抄本。奧澤雷什麼時候撰寫了這段歷史還不得而知。2014 年秋,我詢問過沙特爾圖書館,他們告訴我找不到任何手稿。不過也許更有毅力的研究者能在法國、比利時或盧森堡的當地檔案館找到一些手稿。奧澤雷的《佛教通史》手稿可能反映了 18 世紀 20 年代的西方有關佛教知識的爆發式增長,這與雷慕沙 (Abel-Rémusat)、克拉普羅 (Klaproth) 以及歐仁·比爾努夫 (Eugène Burnouf) 等生活在巴黎的學者密切相關。

## 二、該書的標題、序言和導論

奧澤雷 1817 年的著作包含六個主要部分:

1. 序言 (序, v-xxxii 頁): 作者有關法國新歷史的計劃
2. 導論 (xxxiii-xxxv 頁): 作者寫作此書的原因
3. 通論 (1-34 頁): 宗教通史

<sup>3</sup> Roux, *Nécrologie. M. -J. -F. Ozeray*, Chartres: Garnier, 1860.

<sup>4</sup> 同註 3, 第 8 頁: “還有其他大量的手稿”。

<sup>5</sup> 同註 3, 第 8 頁: “小冊子, 辯護文, 印刷文章或者手稿, 幾乎所有檔都一式兩份, 保存在沙特爾、查特頓和神學院的公共圖書館”。

4. 佛陀研究 (35–112 頁): 本書主體部分

5. 佛教的未來 (112–124 頁)

6. 附錄 (125–134 頁): 亞洲各國佛教概覽

本書序言長達 27 頁，認為法國需要一段新的歷史，正如伏爾泰 (Voltaire) 所指出的那樣：“要研究法蘭西的歷史”<sup>6</sup>。然而，奧澤雷斷言，他規劃中的法國史相當一部分是對過往歷史書寫的重述，與此不同，他對佛陀的研究開闢了一個廣闊的新領域，提供了新的視角 (xxxii 頁)。雖然佛教好像是一個異域話題，但它與法國和歐洲有著極其密切的聯繫，原因正如作者所言：“在這裡，我們將發現我們最早的淵源和大部分的傳統” (xxxii 頁)<sup>7</sup>。

在接下來的三頁“導論”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奧澤雷認為佛教的研究“有益於人類的知識”，因為在許多習俗迥異的國家，佛教“被一億多人所追隨”<sup>8</sup>。在奧澤雷看來，佛陀的宗教主導了從印度到日本大廣大區域，不僅被描述為世界“各種信仰崇拜中傳播最廣的”，也是最獨特的，因為它“戰勝了面積最廣、人口最多的東方世界的原始信仰”<sup>9</sup>。據說，創始人佛陀並不知道“摩西以火炬引領我們來到世界的搖籃”，因此也不知道《舊約》這“最古老也最真實的傳統”<sup>10</sup>。上帝啟示為猶太人所守護，佛教未沾其恩澤，奧澤雷認為佛陀的教義“不過是眾多哲學思

<sup>6</sup> “法國的歷史仍有待書寫”。(第 vii 頁) 奧澤雷顯然沒有完成如此全面的歷史寫作；但他出版了幾本研究法國地方城鎮、教堂和城堡的著作，例如沙特爾大教堂以及布容城堡的研究。

<sup>7</sup> “我對印度 (宗教) 教師的論述帶我們進入迥異於我們的道德世界。在這裡，我們將找到我們最初的淵源和大部分的傳統”。(第 xxxii 頁)

<sup>8</sup> “但如果他所表達的觀點背後有超過一億人支持，而他們生活在不同的法律之下，文化風俗也千差萬別，那麼難道他不值得引起人們的興趣；難道不應該搜集相關文獻，看看在智慧和道德方面對人類的知識有何益處?” (第 xxxiii 頁)

<sup>9</sup> “這位道德哲學家將目光投向我們半球這些地區特有的宗教，尤其是佛教，這是所有這些宗教文化中最普遍的一種，因為它從印度河延伸到日本，最特別的是，因為他獨自戰勝了東方最大、人口最多的國家的古老信仰”。(第 xxxv 頁)

<sup>10</sup> “佛陀不是最古老，最正宗的傳統的傳承者；他並沒有走在摩西將我們帶到世界搖籃的火炬的光芒之下，而是讓我們思考創造的令人欽佩的工作”。(第 xxxiii 頁)

辨的一種，創造它的天才先是自欺，再以宗教的魅力去迷惑人們”<sup>11</sup>。然而，面對沉迷於多神主義和自然崇拜的人們，佛陀以輪回（xxxiv 頁）的概念為基礎，為亞洲民眾提供了一套新的非凡的“獎懲制度”。在奧澤雷看來，佛陀“偉大而崇高的道德”禁止人祭，也禁止殘忍地遺棄老人和嬰兒。此外，它規定尊重人及其財產，節儉，持重冷靜、並尊重動物<sup>12</sup>。

在奧澤雷的“導論”中，佛陀及其所創的泛亞洲的宗教便這樣被精簡的呈現在全球宗教歷史背景下。正如奧澤雷長長的書名暗示的那樣，人類第一個宗教存在於對真神上帝的崇拜；但這種原始的一神崇拜逐漸退化為各種形式的偶像崇拜，最終將人、怪物和動物神化。在各種形式的多神崇拜主導世界的時代，作為立法者及“苦行哲學家”佛陀通過一種新的輪回教義，由此“帶給東方諸民族一種不那麼粗俗的多神崇拜的、解放了荒謬恐怖的崇拜，並且提供了一種宗教道德”<sup>13</sup>。

### 三、奧澤雷的通論

力勸讀者關注他 35 頁通論是因為，這可以使讀者在“多神崇拜這種的主要宗教變異”這一大背景下理解“其中最突出的”“浮屠或佛馱的宗教”（xxxvi 頁）<sup>14</sup>。作者提出了他對宗教起源的總體看法。正如《舊約》所載，人類的第一宗教是建立在承認上帝是宇宙的創造者和保護者的基

<sup>11</sup> “Sa doctrine n’est qu’une de ces spéculations philosophiques qui font illusion au génie qui la conçoit, et aux peuples dont les yeux ont été fascinés par d’autres prestiges religieux.” (p. xxxiii)

<sup>12</sup> “它最令人驚歎的莫過於其偉大崇高的道德準則。特別是當它禁止活人獻祭，禁止遺棄老人，禁止棄嬰，尊重個人的生命及其財產，要求善用財產，要求人們保持清醒時，它會因崇高的道德而獲得勝利；不只一時，它試圖喚醒人們的懊悔，從生活中抽離卑鄙，為我倒上甜甜的美酒，因為智慧而不濫用”。（第 xxxv 頁）

<sup>13</sup> “在這種大量的錯誤觀點中，一位生於東亞的人向人們展示了一種不那麼粗俗的多神教，脫離了最駭人聽聞的迷信的崇拜，給人們一種宗教道德，通過非常特別的系統，尤其是新的輪回的觀念創立了一種懲罰和獎勵制度。熱情的教導者和樸素的哲學家是其頭銜；這也是其神話的程度”。（第 xxxiv 頁）

<sup>14</sup> “這是對浮屠或佛馱宗教中多神教主要宗教差異的一瞥，也是所有這些宗教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第 xxxvi 頁）



礎上的<sup>15</sup>。但很快，上帝的“精神本質”就與物質形式和物體相聯繫，上帝被認為是照亮這世界的太陽的靈魂。這還不是真正的多神論，因為太陽的光線仍被視為上帝發出的<sup>16</sup>。

奧澤雷的論證主要根據安東尼·巴尼耶（Antoine Banier）1711年的《寓言闡釋史》（*Explication historique des fables*），1813年的《神秘的神話與歷史》（*du Tressan's La mythologie comparée à l'histoire*）以及1805年杜洛（Dulaure, 1755–1835）《先於並孕育偶像崇拜和人物崇拜的宗教崇拜》（*Des cultes qui ont précédé et amené l'idolatrie ou l'adoration des figures humaines*）<sup>17</sup>，他進一步解釋道，多神崇拜的出現源於對月亮的崇拜，因之單一偉大的上帝的概念受到侵蝕。這導致了“對第一推動力的遺忘”和其他錯誤的觀念的產生，例如構成宇宙的原初物質永恆存在（第3頁）。據說摩西曾與這些“錯誤的最初來源”作鬥爭，這些錯誤根植於造物主上帝與其創造物的混同，如月亮（第3頁）、太陽系的行星（第4–5頁）、天（第4–5頁）、地（第5–6頁）、山（第6–7頁）、水（第7–8頁）、林（第8–9頁），最後則是人（第9–23頁）和動物（第28頁）。

雖然奧澤雷的宗教史總體結構反映了上述作者的觀點，但他所引用的大多數有關亞洲的材料都來自博學的旅行者和大使的報告，而不是傳教士<sup>18</sup>。我會選出奧澤雷的兩個主題來說明這一點：關於佛教創始人的信息和奧澤雷對佛教歷史的看法。

#### 四、一位創始人和一個信條

不同於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的許多學者，例如威廉·瓊斯（William

<sup>15</sup> “他認出了最初的生命，並在宇宙永恆幾何及其創造者和守護者的偉大面前十分謙卑。”（第1頁）

<sup>16</sup> “他的神性本質上是精神性的存在，獲得了可見的形式、至尊者、正是是白日之星（太陽）的靈魂，以其身軀散發的光芒照亮世界。”（第1–2頁）

<sup>17</sup> 有關奧澤雷關於宗教一般歷史的論述，參見附錄“有關亞洲與亞洲宗教的文獻”。

<sup>18</sup> 參見附錄“有關亞洲與亞洲宗教的文獻”。

Jones)<sup>19</sup>，喬治·史坦利·費伯 ( George Stanley Faber )<sup>20</sup>，約瑟夫·格雷  
斯 ( Joseph Görres )<sup>21</sup> 以及卡爾·李特爾 ( Carl Ritter )<sup>22</sup> 等人認為存在兩個、  
三個甚至四個佛陀，並依相關猜想構築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假說。奧澤雷  
堅信歷史上佛教只有一個創立者，但因為地區和語言的差異，他有很多  
不同的名字：

在錫蘭，人們叫他浮屠 ( Buddou )、佛馱 ( Boudha )、巴烏 ( Baout )、  
布德 ( Bundh )、布杜 ( Bouddou )；在印度則是毗濕奴 ( Vichnou )，  
佛 ( Boudh ) 或佛馱 ( Boudha )；在西藏則是摩訶摩尼 ( Mahamou-  
nie )，在不丹則是訶那拉扎 ( d'Herna-Raja )。卡爾梅克人用釋迦摩  
尼 ( Chaka-Chimouna, Chaka-Mouni, Schji-Mouni 和 Sakji-Mouni )  
來稱呼他；還有蒙古人的齊齊摩尼 ( Chichi-Mouni )。在緬甸帝國 ( 阿  
瓦古城，勃固，若開邦和暹羅的一部分 )，他的名字是喬達摩 ( Gaud-  
ma )、汨彤 ( Gouton )；在暹羅則是 Sommonacodon；在東京區 ( 越  
南 ) 則為喬得瑪 ( Gaudma )；在中國，則是佛或佛陀 ( Fo, Fo-  
和 Fohi )；在日本，則有釋迦 ( Xaca, Chaca 或 Scaka )、Boudsdo、  
Boudso。( 35-36 頁 )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段裡，奧澤雷沒有引用任何一位傳教士的資料。  
相反，他只依賴去了錫蘭的諾克斯 ( Knox ) 和里貝羅 ( Ribeiro )、到過  
日本的坎普法 ( Kaempfer )、桑伯格 ( Thunberg ) 以及荷蘭大使館的記  
錄、遊歷不丹和西藏的特納 ( Turner )、參訪緬甸的塞姆斯 ( Symes ) 和

<sup>19</sup> Urs App, "William Jones's Ancient Theology," *Sino-Platonic Papers* 191 (2009): 1-125.

<sup>20</sup> George Stanley Faber, *The Origin of Pagan Idolatry Ascertained from Historical Testimony and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3 vols., London: F. & C. Rivingtons, 1816. Faber 的佛教理論主要見於 vol. 2.

<sup>21</sup> Joseph Görres, *Mythengeschichte der asiatischen Welt*, 2 vols., Heidelberg: Mohr und Zimmermann, 1810.

<sup>22</sup> Carl Ritter, *Die Vorhalle europäischer Völkergeschichten vor Herodotus, um den Kaukasus und an den Gestaden des Pontus*, Berlin: G. Reimer, 1820.

瓦倫西亞 (Valentia)、到了泰國的拉·婁貝雷 (La Loubère)、去過越南的理查 (Rihard)、走訪俄羅斯的帕拉斯 (Pallas) 和遊歷中國的小德金<sup>23</sup> (Chrétien-Louis-Joseph de Guignes) 等遊客的報告。這與羅傑·坡爾·德洛瓦 (Roger-Pol Droit) 對奧澤雷“關於佛陀沒有提供任何新資訊”的斷言 (1997: 62) 和弗雷德里克·勒努瓦 (Frederic Lenoir) 認為奧澤雷的書只反映了“時代偏見”的論斷 (1990: 90) 並不相符。當然奧澤雷不是沒有偏見，但他也不像威廉·瓊斯、約翰·戈特弗里德·赫爾德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或湯姆斯·莫里斯 (Thomas Maurice) 等當時更知名的作家那樣，沉迷於語源學的偏偏浮想或遙遠的歷史或神話學推測。相反，他的觀點基礎在於創始人佛陀和其宗教統一性：(1) 許多印刷資料中對佛像的研究；(2) 以及到過亞洲各地的遊客給他提供的關於佛陀和佛陀崇拜的報告。奧澤雷關於佛教創始人的章節如此開篇：

毫無疑問，這個人只有一個身份；即使沒有其他佐證，只要看一眼為紀念他而建的廟宇裡的主要雕像，就足以使人相信：這些雕像雖然略有不同，但主要形式是相同的。他的姿態引人沉思；他身著寬大的長袍，頭上戴的帽子隨地區不同而有相應差異，他的眼睛一動不動地盯著地面，兩腿交叉，雙手合十，或以某種方式放在膝蓋上<sup>24</sup>。

據我所知，西方有關佛陀的形象第一次出現在洛倫佐·帕納蒂亞 (Lorenzo Pignoria) 1615 年帕多瓦 (Padova) 版的文森索·卡特裡 (Vincenzo Cartari) 關於古代眾神形象的著作中<sup>25</sup>。在隨後的兩個世紀裡，歐

<sup>23</sup> 小德金，是歐洲大陸研究中國的先驅大德金 (約瑟夫·德·金) 的兒子，他在西方出版了第一部佛教經書的譯本。有關小德金，參見 Urs App, *The Birth of Oriental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0), pp. 223–231.

<sup>24</sup> 同註 11，第 36–37 頁。

<sup>25</sup> Lorenzo Pignoria, ed., “Seconda parte delle Immagini degli dei indiani. Aggiunta al Cartari da Lorenzo Pignoria,” in Vincenzo Cartari, *Le vere e nove Immagini de gli dei delle antichi*, Padova: Piet-

洲發表了大量關於亞洲國家及其宗教的報道，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圖畫和版畫。對這些材料的研究使奧澤雷得出佛教創始人的相關結論的關鍵。他的書裡沒有插圖，但他引用眾多這類材料，包括婁貝雷有關泰國圖卷的銅版畫，桑伯格和坎普法關於暹羅和日本的報告，彼得·帕拉斯 ( Peter Pallas ) 研究俄羅斯卡爾梅克部落的豐富插圖，邁克爾·賽姆斯 ( Michael Symes ) 筆下的緬甸，聖·巴薩羅繆主教 ( Paulinus Sancto Bartholo ) 注解的有關印度的卷宗，以及喬治·瓦倫西亞 ( George Valentia ) 遊歷印度和錫蘭的見聞<sup>26</sup>。奧澤雷大部分的引證材料是法語原文或法語翻譯件，其中一些出版於 18 世紀末 19 世紀初。奧澤雷研究和引用的材料十分豐富，一小部分圖像材料如下 ( 圖 2-圖 8 )：

歐洲商人、學者和大使出版的雕像複製品證實了佛教與印度的聯繫。威廉·瓊斯著作的編輯約翰·肖爾 ( 廷茅斯勳爵 ) 在訪問印度北部的菩提伽耶時，畫了一尊佛像 ( 圖 9 )，此佛像原來由賽姆斯 ( 1800 年 ) 和一尊緬甸佛像的版畫一起印出 ( 圖 10 )。

奧澤雷仔細研究了這些插圖，他同賽姆斯推斷它們展現的一定是同一個人，也就是佛教的創始人，根據大量的報導，他的宗教從錫蘭和印度傳播到東南亞、中亞、亞洲北部和東亞。

奧澤雷引用的第二組材料，根據的是已發表亞洲諸國家對創始人佛

ro Paolo Tozzi, 1615. 有關此圖像的簡單討論，參看 Urs App, *The Cult of Emptiness* (Wil: University Media, 2012), pp. 113-115.

<sup>26</sup> Simon de la Loubère, *Du Royaume de Siam* (Amsterdam: Abraham Wolfgang, 1691), vol. 1, p. 517. Carl Peter Thunberg, *Voyages de C. P. Thunberg, au Japon, par le Cap de Bonne-Espérance, les Isles de la Sonde, &c* (Paris: Benoît Dandré, 1796), vol. 3, p. 345 ff. Kaempfer vol., 1, p. 46. Dutch embassy to Japan vol. 1, p. 103. Peter Simon Pallas, *Voyages de M. P. S. Pallas, en différentes provinces de l'empire de Russie, et dans l'Asie septentrionale, traduits de l'allemand, par M. Gauthier de la Peyronie, Commi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Paris: Maradan, 1791. Michael Symes, *Relation de l'ambassade anglaise envoyée en 1795 dans le royaume d'Ava ou l'empire des Birmans. Suivi d'un Voyage fait, en 1798, à Colombo, dans l'Île de Ceylan, et à la Baie de Da Lagoa, sur la côte orientale de l'Afrique; -de la Description de l'Île de Carnicobar et des ruines de Mavalipouram. Collection de Planches*. Translated by J. Castéra (Paris: F. Buisson, 1800), vol. 2, p. 320. Valentia vol. 2, p. 339.



圖 3-5 聖·巴薩羅繆主教 1808，  
卷 3：波吉亞博物館的兩尊佛像和一尊喬達摩佛像

陀的宗教活動的相似性報導。奧澤雷說，第一個被這種相似性所震撼的西方人是恩格柏特·坎普法，他“相信暹羅和日本之間的聯繫”（38 頁）。隨後，婁貝雷證明了“Sommonacodom 是幾個印度民族的宗教立法者，（暹羅）王國的這個信條延伸到了其他幾個國家”（38 頁）。結合桑伯格“浮屠或佛馱是所有東方國家所崇拜的”這一結論<sup>27</sup>，以及西方大使在亞洲各國的報告，奧澤雷認為“近年來，這一真理已經無可爭議”（38 頁）。為了支持自己的觀點，他引用了中國大使在緬甸膜拜佛像的報導，緬甸皇帝關於緬甸喬達摩與錫蘭佛陀身份相同的聲明，中國皇帝承認西藏達賴喇嘛的宗教權威，卡爾梅克人和蒙古人都承認拉薩布達拉宮為宗教中心，還有西藏和印度的宗教聯繫（39-40 頁）。但是奧澤雷，像他同時代的許多人一樣，他把佛教和婆羅門教混為一談，認為印度婆羅門把他們的信條移植在了更古老的佛教組織上<sup>28</sup>；當他把印度納入真正的佛教國家時，這個圈子畫得太大了。

<sup>27</sup> 同註 26 Thunberg 書，第 4 卷，第 223 頁：“[錫蘭]人的敬愛之情與東方民族相同”。

<sup>28</sup> 同註 11，第 40 頁，“烙印在佛教肌理上”。關於這種觀點有許多早期例子，參見註 23 和註 25 App 書。



圖 2 婁貝雷, 1691, 第一卷, 第 419 頁: 泰國開國元勳的雕像



圖 6 帕拉斯, 1801, 第 2 卷, 第 13 頁: 卡爾梅克部落的佛教法會, 聖壇上有雕像



圖 7 坎普法,《日本歷史》, 第一卷, 1729: 泰國佛教寺廟和大佛



圖 8 聖·巴薩羅繆主教, 1808, 卷 3: 波吉亞博物館的兩尊佛像與奎師那 (印度) 的一幅畫的對比



圖 9 賽姆斯，1800，《普朗舍圖集》，第 7 圖版：菩提伽耶佛陀造像素描，印度，約翰·肖爾（John Shore）繪製（廷茅斯勳爵 Lord Teignmou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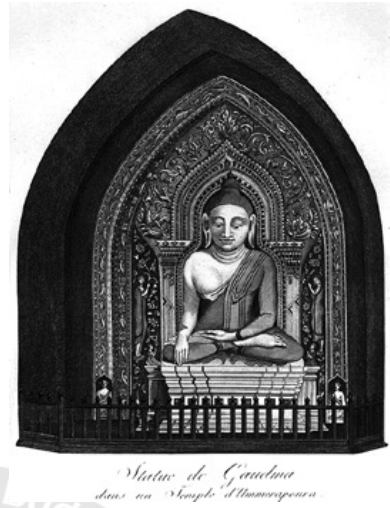


圖 10 賽姆斯，1800，《普朗舍圖集》，第 15 圖版：喬達摩（佛陀）佛像，緬甸阿馬拉普拉一所佛教寺院

## 五、歷史與神話中的佛陀

奧澤雷並不接受威廉·瓊斯、婁貝雷、聖·巴薩羅繆主教等人的觀點，認為佛陀只是一個神話人物，代表“天堂或墨丘利之神，或科學與藝術之神”，奧澤雷用“這是一個被神話的人”為標題開始討論佛教的創始人，開篇即說“此神是人”<sup>29</sup>。在回顧了古希臘和波斯關於佛陀的資料後（41–46 頁），奧澤雷引用了最近資料，《亞洲研究》（*Asiatick Researches*）第一卷的法語譯注本，以及威廉·錢伯斯（William Chambers）<sup>30</sup>的一篇文章來支持佛教的創始人一定居住在印度北部的觀點。奧澤雷討論了關於佛陀出生的時間和地點的各種相互矛盾的理論（46–48 頁），推斷佛陀

<sup>29</sup> 這一節的標題是“人是神的化身”，第一句話是“上帝保佑我們”（第 40 頁）。

<sup>30</sup> 同註 26 Symes 書，第 3 卷，第 234–272 頁。錢伯斯的這篇文章由賽姆斯出版，是他《馬馬拉普拉姆的雕塑和廢墟的一些記錄》（*Some Account of the Sculptures and Ruins at Mavalipuram*）一文的法文譯本，最早出現在 1788 年《亞洲研究》（*Asiatick Researches*）第 1 卷，第 145–170 頁。

應該是西元前 1029 年出生在錫蘭 ( 46-51 頁 )<sup>31</sup>。這種觀點依據的不僅是恩格柏特·坎普法的日本佛曆 ( 奧澤雷認為這是最權威的 )，而且也基於威廉·瓊斯關於當今印度時代開始的計算<sup>32</sup> 和有關西藏歷史紀年的報告 ( 50-51 頁 )。有趣的是，坎普法有關佛教源於埃及的推測影響了法國《百科全書》作者科魯斯 ( Mathurin Veyssiere de la Croze ) 以及其他很多人<sup>33</sup>，對此奧澤雷沒有任何遺漏。

就像現代佛教學學者試圖剝離層層厚重的神話和傳說以揭示歷史的內核一樣，奧澤雷在《浮屠的生平與教義》( *Vie et doctrine de Buddou*, 51-52 頁 ) 中首次提出了他所接受的有關佛教創立者的生活和教育的事實，然後才講述神話範疇信息 ( 52-56 頁 )。無論是“歷史的”還是“神話的”部分，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省略了什麼，而不是他試圖囊括什麼。奧澤雷並沒有基於傳統佛教傳說和傳教士的捏造來提供一個“基督耶穌式”的佛陀傳記<sup>34</sup>，他對佛陀短暫一生的描述借鑒了坎普法的資料，他將這些信息歸結為幾句話：

佛陀的一生都致力於他所從事的事業，如果我們從神話傳說中剔除那些人們習慣誇大、毫無歷史真實性的傳說，那麼他的傳記是非常簡短的。他是一位國王 ( 據日本傳統為錫蘭國王 ) 之子，19 歲時離開了父親的宮殿，拋棄了妻兒，成為一位以有名的苦行隱士的弟子。不久，他就表現出超人的才情，但又充滿慈悲，總是貫注於

<sup>31</sup> 錫蘭被認為是巴利文文獻的寶庫，來自泰國和緬甸的各種報導都支援錫蘭是佛教發源地的觀點。凱慕夫爾使用的日本材料提到佛陀的出生地是天竺 ( Tenjiku ) 和摩揭陀國。有關天竺 ( 指整個印度次大陸，有時也指東南亞國家 ) 的確切位置，凱慕夫爾提供的資訊相互矛盾。西元前 1029 年根據的是日本的材料，反映了東亞常見的佛曆。在奧澤雷的書出版後的幾十年裡，對梵文、巴利文和藏文佛教資源的研究表明，東亞的佛曆是錯誤的，並非錫蘭而是印度才是佛教及其創始人的誕生地，而他生活在西元前 5 世紀左右。

<sup>32</sup> William Jones, “Sur la chronologie des Hindous,” *Recherches Asiatiques* 2 (1805): 179. 有關瓊斯的計算和依據的偽造文本，同註 19 書，第 60-65 頁。

<sup>33</sup> 同註 23 App 書，第 2 章和第 3 章。

<sup>34</sup> 傳教士有關佛陀生平的記載和新創造，參見註 23 和註 25 App 書。



抽象和形上的思想，卻不斷地掛念著他人的幸福。……他活了 69 歲，死於耶穌生前 950 年<sup>35</sup>。

值得注意的是，奧澤雷研究了大量關於佛陀和佛教的文獻，且參考了數百條其他資料，但他幾乎完全依賴恩格柏特·坎普法（Engelbert Kaempfer）所提供來自日本方面的信息，以此為佛陀生活的“歷史核心”。我在之前的書中已經指出，日本在歐洲發現佛教過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從 16 世紀中期開始，前往日本的傳教士所提供的信息極大影響了歐洲人對亞洲宗教（包括佛教）的看法。

1727 年坎普法《今日日本》（*Heutiges Japan*）英文手稿的一部分取名為《日本的歷史》（*The History of Japan*）出版，1729 年的法文版出版（見圖 11），一組新的、非常不同的資料流傳開來：該書詳細描繪了 1690 年左右日本風俗和宗教的具體狀況。雖然在日本他只待了大約兩年的時間，且主要活動限於江戶長崎附近的出島，坎普法從能力出眾的日本助理們那裡得到了很多幫助，他們不僅為他提供優質的口述信息，還把重要的日本資料翻譯成了荷蘭語<sup>36</sup>。年輕的瑞士人約翰·卡斯帕·舒切爾（Johann Kaspar Scheuchzer）在介紹坎普法日本文稿的英文譯本時，所列材料來源超過四頁<sup>37</sup>。坎普法的研究對歐



圖 11 坎普法《日本》第一卷扉頁，奧澤雷的主要參考資料之一

<sup>35</sup> 同註 11，第 51–52 頁。

<sup>36</sup> 有關凱慕爾夫和他對“東方異教”的觀點，參見註 23 App 書，第 172–185 頁。

<sup>37</sup> Engelbert Kaempfer, *Histoire naturelle, civile et ecclesiastique de l'Empire du Japon* (Amsterdam: Herman Uitwere, 1732), vol. 1, pp. LX–LXV. 奧澤雷使用的是 1732 年的法文譯本，依據的是舒切爾（Scheuchzer）的英譯本。

洲人眼中的全球宗教景觀產生了直接而持久的影響<sup>38</sup>。該書的記述和插圖在十八世紀的百科全書、遊記、世界風俗和宗教調查中隨處可見。奧澤雷的書表明,坎普法的影響一直持續到19世紀。不僅奧澤雷、他的朋友們,包括歐洲第一位漢學教授雷慕沙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都是坎普法著作的熱切讀者;那時,坎普法對“東方異教”的推測對歐洲人對亞洲宗教和哲學的看法已經影響了近一個世紀。

如上所述,奧澤雷關於佛陀生活和教導的“歷史”資訊依賴於坎普法有關佛教及其創立者的章節<sup>39</sup>,其中就討論了佛教及其創始人佛陀的錫蘭血統,他十九歲時遺棄妻兒等問題。坎普法的報告包含了更多的細節;例如,他這樣描述佛陀的“過度投入”:

他們稱這種深度投入的狀態為坐禪,看到真相的神聖之人被稱為悟り (開悟) 之人。以釋迦牟尼佛為例,這種精神投入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至於他藉此洞悉了宗教中最隱秘、最重要的一點,從而發現了天堂和地獄的存在和性質,它們是報應和懲罰的場所;是我們靈魂來生的狀態和輪回,以及獲得永恆極樂的必經之途<sup>40</sup>。

坎普法使用“坐禪”和“開悟”等日文詞彙,顯示了日本禪宗佛教的影響,這也是佛陀“最隱秘、最重要的宗教觀點”,反映了包括日本在內的許多亞洲國家普遍信奉的佛教。啞劇《大念佛狂言》可追溯到14世紀,至今京都還有上演,死者被拖到地獄之王 (閻羅王, 閻魔王) 面前審判。邪惡的人最終在地獄裡被魔鬼可怕地折磨,而悔過和善良的人則被帶到阿彌陀佛的天堂——淨土。坎普法解釋道:

閻摩 (閻魔), 更尊敬的稱呼則是閻羅王 (閻魔王) (婆羅門人,

<sup>38</sup> 歐洲大陸第一次使用凱慕爾夫日本著作 (甚至早於法語譯本) 的重要著作是 J. F. Bernard, *Cérémonies et coutumes religieuses des peuples idolâtre* (Amsterdam: J.F. Bernard, 1728), vol. 2.

<sup>39</sup> “佛教崇拜或者對其創建者的崇拜”, 參見註 37 Kaempfer 書, 第 2 卷, 第 59-70 頁。

<sup>40</sup> 同註 37 Kaempfer 書, 第 61 頁。

暹羅人和中國人都知道這個名字)，他是幽冥和痛苦之界嚴正的法官和主宰。在他前方有一面叫做“業鏡”的大鏡子（即知識之鏡），人類的一切邪惡行為以其恐怖可憎的方式呈現在他面前<sup>41</sup>。（圖 12）

關於佛教天堂及其地獄的報導也從其他亞洲國家傳到了歐洲，並發揮了重要作用。各個國家佛教信徒所崇拜的神靈或聖人的描繪和描述也是如此。對奧澤雷來說，它們由一個複雜神話的發展而來，“其基礎是佛陀的生平和教義”（第 52 頁）。除了天上的阿彌陀佛，地獄的閻羅王，地上的佛陀，奧澤雷的資料中還描述了一些女性以及多神奇人物，他把他們列為“精靈”或“次要的神”（*dieux secondaires*）（55 頁）。奧澤雷沒有自己捲進複雜的佛教眾神系統，而是只提到了幾個人物，僅僅四頁紙後，他就說，要進一步詳細描述是很乏味的，因為這些“神話的畸形變種”不過是佛陀基本教義的副產品（55-56 頁）。（圖 13）



圖 12 閻摩（梵文 *Yama rājā*），地獄可怖的審判者。鎌倉（日本），閻魔堂；烏爾斯·艾普供圖

## 六、佛的根本教義

雖然奧澤雷對佛陀核心教義的闡述整體上遵循坎普法的報告，但有

<sup>41</sup> 同註 37 Kaempfer 書，卷 2 第 64 頁：“Jemma, nommé autrement & exprimé avec un caractere plus venerable Jemma O, (c'est sous ce nom qu'il est connu aussi des Bramins, des Siamois, & des Chinois) est le juge sévère, & le chef de ce lieu de ténèbres, & de misère. Toutes les actions vitieuses du genre humain paroissent devant lui avec tout leur horreur, & de la manière la plus odieuse, au moyen d'un grand miroir placé devant lui, & nommé Ssofarino Kagami, ou le miroir de la connaissance.” (Kaempfer 1732, vol. 2: 64)。



圖 13 卡爾梅克部落的佛像。參看 Peter Simon Pallas, *Sammlung historischer Nachrichten über die mongolischen Völkerschaften*. St. Petersburg: Kaiserli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801, vol. 2, plate 9. 再現於奧澤雷所使用的 1788–93 年法國版插圖冊（巴黎：馬拉丹）。

一個顯著的不同：坎普法通常避免使用“神”這個詞，而奧澤雷所言的佛陀則相信天堂之神會獎勵善人，地獄之神會懲罰惡人：

在思考宗教最重要的問題時，他認為有一個神明獎勵美德，另一個神明懲罰惡行和犯罪；正直之人安居於寧靜的天堂，邪惡之人困住在幽暗的陰間。靈魂不朽及其轉世；輪回則是累積功德的手段。他為人們提供了一種善良慷慨卻又荒誕苛刻的道德。另一方面，雖然他把所有感恩的責任都獻給了神，但認為必須禁止祭祀，並強烈譴責戕害人命。在他眼裡，東方民族的地方神靈只是控制宇宙各處的精靈，他們主導自然界的各種進程<sup>42</sup>。

<sup>42</sup> 同註 11，第 51–52 頁：“Méditant les points les plus importants de la religion, il reconnut un

奧澤雷提到佛陀弟子收集的佛陀“格言”和“他親手所寫或命人所寫的冊頁”以及錫蘭所存“神學作品集”，他遵循坎普法的意見認為《妙法蓮華經》是印度以東所有國家的“聖經”。奧澤雷寫書之時，還沒有梵文典籍的西文翻譯本，巴利文典籍方面，除了婁貝雷<sup>43</sup>出版的一些片段，同樣不為西方世界所了解。然而，奧澤雷認為自己已經能夠呈現出“正統”佛教徒的宗教體系，並將其歸納為五個要點。

一個重要的轉變是，奧澤雷對佛教教義的介紹並不依賴於傳教士的故事，而是依賴於坎普法（日本）、帕拉斯（蒙古）和蓋伊·塔查爾（泰國）有關民間佛教報導。他的佛陀既不是無神論者，也不是虛無主義者，而是一位“道德哲學家”，被信徒們尊為“上帝”，而且曾經傳授了五種基本教義。雖然這些教義的內容主要來自坎普法對“（佛陀）教義最本質的要點”（1732: 2. 61–65）的總結，但奧澤雷忽略了佛教五戒、十戒、五百戒等重要特點。相反，他創造了一個包含三個“神”的教義結構，這在坎普法那兒是找不到的，但似乎受到了蓋伊·塔查爾（Guy Tachard）對泰國佛教徒世界觀解釋的啟發。奧澤雷的前三篇佛教“原始教義”的文章涉及佛教的“三神”及其各自的領域：天堂、地獄、人間以及天堂中的阿彌陀佛、人間的佛陀、地獄中的閻羅王。（圖 14）

## 七、佛教的歷史、正統和異端

奧澤雷花了較長篇幅（83–111 頁）描述“佛陀宗教的總體狀況，其

dieu rémunérateur de la vertu, un autre vengeur du vice et du crime, la paisible demeure des bons au ciel, le sombre séjour des médiants aux enfers, l'immortalité des âmes, leur transmigration, la métépsychose comme voie et moyen d'acquérir des mérites; imbut les peuples d'une morale bonne et généreuse, mais ridicule et outrée. D'un autre côté, consacrant tous les devoirs de la reconnaissance envers la divinité, il crut devoir proscrire les sacrifices, et se prononça avec horreur contre ceux où l'on répandait le sang de l'homme. Pour les dieux des nations orientales, il ne vit en eux que des génies préposés aux diverses parties de l'univers, en dirigeant les différentes opérations de la nature.”

<sup>43</sup> 同註 23 App 書，第 120 頁和第 438 頁。



圖 14 守衛地獄的馬面，帶領罪人在佛教的地獄受刑。日本中古地獄卷軸細節  
(家永三郎主編《地獄草紙》，東京：角川正藤，1976年)

異端邪說，以及它所滲透地區的影響”。奧澤雷在解釋不同國家的巨大差別時設立了一個由佛祖創立的“原始的”“正宗的”教法（這在錫蘭、東南亞、中國和日本保存相對完好），於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佛教的墮落形式，這就是在印度、西藏、不丹、西伯利亞和蒙古等地隨“分裂”和“異端”興起的佛教傳統。正統的最高代表當然是創立者佛陀。在結語中，奧澤雷將他描述為“一位著名的人物”、“一位傑出的哲學家”和“一位為眾生的幸福和人類的福祉而生的聖人”。但是，這種讚揚是相對的，緊接著的一段話這樣寫道：

作為一個被神化的人，他是東亞地區最重要的宗教立法者。雖然他的教義只是隨第二批謬見，雖然它摧毀了那些粗鄙的迷信，但仍然保留了其罪惡根源：它感染了多神論。關於道德，佛陀向人們介紹了自我的職責——不過他往往誇大其詞，總是想要人們更加熱衷於踐行這些職責<sup>44</sup>。

<sup>44</sup> 同註 11，第 111 頁。

因此對奧澤雷來說，佛教在亞洲的勝利本質上是建立在錯誤基礎上的。不過，佛陀的“偽智慧”為不同地區帶來了相當大的、各自不同的好處：

他的影響並非處處相同。在某些地方，佛教戰勝了人們甚至無法自圓其說的信仰，戰勝了沒有文字記錄的短暫存在的傳統，戰勝了地方神靈，這些神靈在繁榮時受到最虔誠的崇拜，但卻在沒落的時候遭到鄙視和憎恨。在其他地方，它以其“偽智慧”同官方認可的錯誤作鬥爭，同哲學的模糊觀念作鬥爭，同楷模的誘惑作鬥爭，同慣常做法的絕對控制作鬥爭，同習俗的力量作鬥爭<sup>45</sup>。

奧澤雷認為佛教從其發源地錫蘭（斯里蘭卡）沿“兩條截然不同的路線”傳播，一條是“北”線，一條是“西”線<sup>46</sup>（圖 15）。

奧澤雷解釋說，佛教“最原始的教義”在錫蘭、緬甸、泰國、老撾、柬埔寨、越南、中國和日本得以倖存，主要源自於佛教僧侶純粹的道德權威，他們遠離政治與穩定的統治。在這些地區，佛教的律令受到尊重，教條和儀式一經信奉就保持不變，很早以來，佛教的統一性或多或少得到了保護（83 頁）。

## 八、正統的佛教國家

根據奧澤雷的說法，“正統”佛教在 19 世紀初仍然統治著錫蘭（斯里蘭卡）、緬甸以及泰國。在這些國家，在佛去世幾個世紀後便開始信奉佛教了，“佛的教義和故事戰勝了古老的迷信”（126 頁），獲得永久統

<sup>45</sup> 同註 11，第 112 頁：“Son influence n’a pas été par-tout la même. Ici le bouddisme triomphe des croyances dont on ne peut se rendre compte à soi-même, de traditions non écrites, fugitives, sur des divinités locales adorées avec la dévotion la plus vive dans la prospérité, objets du mépris et de la haine dans un moment de désespoir. Là il oppose sa fausse sagesse à des erreurs accréditées, à une lueur de philosophie, à la séduction de l’exemple, à l’empire des usages, à la force des coutumes.”

<sup>46</sup> 如圖 15 所示，奧澤雷所謂“西線”（同註 11，第 83 頁）其實延伸到東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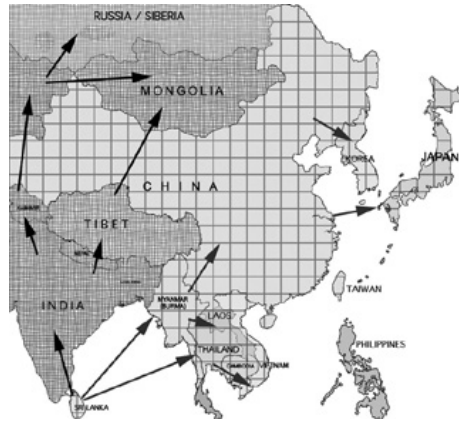


圖 15 奧澤雷有關佛教從其發源地斯里蘭卡傳播路徑的看法。

(1) 細網：奧澤雷的“北”線由印度、不丹、西藏、蒙古和西伯利亞的“異端”、分裂形式的佛教組成。(2) 大方格：奧澤雷的“西方”(實際上是東方)佛教的“正統”一線，從斯里蘭卡延伸到東南亞、中國和日本。艾普繪。

治地位。據說，在錫蘭至少有 100 萬佛教徒 (127 頁)，泰國則約有 500 萬 (暹羅，131 頁)，緬甸約 1700 萬 (131 頁)。奧澤雷認為，在其他東南亞國家，如越南 (如北圻和東京地區) 和老撾，估計有 2000 萬佛教徒 (132 頁)。

佛教在公元後才傳入中國和日本，在這兩個國家——佛教雖然“正統”——從一開始就被迫與儒、道並存，只是被“容忍”的一種存在 (101 頁、107 頁)。關於日本，奧澤雷主要依據的是坎普法提供的資訊。雖然他沒有提到神道教這個詞，但是他用了坎普法對日本本土宗教的描述 (107-110 頁)，以此證明自己有關原始一神信仰的觀點：日本人最初相信“日本諸神中最原初的最偉大的神，他居於天頂、是光和太陽的本質”<sup>47</sup>。奧澤雷還錯誤地認為，佛教是在西元六世紀初由“熱情無限的”“達摩”(菩提達摩) 傳入日本。這位傳說中的先祖——通常被認為是在西元六世紀將佛教禪宗從印度帶到中國的人——因為對坎普法著作的誤譯而成

<sup>47</sup> 同註 11，第 107-108 頁：“Le premier, le plus grand des dieux du Japon, habite au plus haut des cieux; il est l’essence de la lumière et du soleil.”



為日本佛教的創始人。此外，奧澤雷所說菩提達摩不是從“異端”的印度而來，而是從“正統”的泰國（暹羅）出發<sup>48</sup>，由此佛教由發源地斯里蘭卡經泰國、中國傳播至世界盡頭的日本。

至於中國和鞞鞞地區，奧澤雷估計有 1.5 億佛教信徒（132 頁），日本則有 2000 萬（133 頁），但他缺少對朝鮮、琉球群島和臺灣的可靠資料。據他估計，因為中日兩國大約三分之一的人口是佛教徒（133 頁），因此這些地區的佛教徒當有 6500 萬。

## 九、異教的佛教國家

根據奧澤雷的說法，19 世紀初所有潛入佛教在異端邪說中，“被（印度）大部分民族所信奉”的異端邪說最為明目張膽。在這裡佛陀又名毗濕奴，在諸印度民族中“最為成功”，“他為天神建造了眾多的寺廟，仍在告訴我們，他曾主導印度人的心靈”<sup>49</sup>。但是不久，“異端的狂熱”就把正統派的信徒們趕到“幾處山洞或是地下洞穴”，直至今日仍是“對幾個世紀的蹂躪無聲而不朽的見證”（84 頁）。由於這種墮落的異端形式的佛教被“國家的大部分人承認”（84 頁），奧澤雷為佛教行列添加了 6000 萬印度居民（132 頁）。

受“異端”影響的第二大地區包括西藏、不丹、俄羅斯部分地區和蒙古。根據奧澤雷的說法，佛教是從印度傳入西藏的，是“一些來自印度斯坦的佛教徒，他們保留了神聖的教義”（94 頁），但西藏喇嘛的“半神權政體”很快錯上加錯。最重要的是，輪回這一佛教核心教義不再用於弘揚道德行為，而是服務於西藏的“教皇制”。“喇嘛至高無上”和他

<sup>48</sup> “日本民族的皈依是在基督教時代的六世紀初發生的，這種皈依在此之前一直沒有成功。達摩是一個十分精進的人，他將在中國傳播的暹羅事業延伸到日本，實現了這場革命”。（第 110 頁）

<sup>49</sup> 同註 11，第 84 頁：“Lorsque Vichenou (Buddou) parut au milieu d’eux, il eut le plus grand succès; des temples nombreux qu’il avait élevés au dieu du ciel, quelques-uns retraceraient encore combien il avait eu d’empire sur les esprits.”

們的“天佑教宗”(96頁)、一妻多夫制(99–100頁)、以及不同於傳統火葬的安葬習俗(100–101頁),這些被拿來說明西藏和不丹占統治地位的佛教異端的主要特徵。這加上兩個國家,又有600萬的異端佛教徒。再增加伊留申人(Eleuths)、卡爾梅克人(Kalmyks)、布里亞特人(Buriats)、烏斯貝克人(Usbeks)以及各種信奉藏傳佛教的蒙古部落的人口,還有600萬(128–130頁),這就使非正統或異端佛教徒總數達到7200萬。

為了避免被指責誇大其詞(134頁),奧澤雷將龐大數字縮減到一個謹慎的“超過1億”佛教徒(50頁)<sup>50</sup>,不過他仍堅持認為佛教是“我們的宗教之師佛陀的宗教是大東印度(the East Indies)地區流傳最廣的宗教、信眾最多的宗教、唯一的一個本土宗教,也是唯一通過共同信仰將多個民族聯繫在一起的宗教”<sup>51</sup>。如上所述,17世紀中葉,佛教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的觀點已經在傳教士的作品中傳播開來<sup>52</sup>。雖然奧澤雷錯誤地認為婆羅門教是墮落的佛教的一種形式,但在19世紀中後期之前,“並沒有‘佛教’一統亞洲內部和有關亞洲的各種不同言論”的觀點<sup>53</sup>,最終必須被拋棄。

## 十、結論

奧澤雷的佛教觀不僅異於啟蒙和浪漫主義時代的觀點,而且也不同於更新近的觀點。該書1817年出版後的幾十年裡,歐洲學者開始研究梵語、巴利語、漢語、藏語和蒙古語等語言的佛教文本。通過這些研究,西方對佛教及其歷史、經典、不同的傳統和亞洲不同地區的廣泛宗教實踐的理解取得了重大進展。

<sup>50</sup> 奧澤雷引文(同註11,第125頁)的第一個數據說“超過一億人”,指的是他前言所說佛教有超過一億信徒。

<sup>51</sup> 同註11,第134頁。

<sup>52</sup> 同註25 App書,第143頁和第151頁。

<sup>53</sup> Tomoko Masuzawa, *The Invention of World Religions*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p. 122.

儘管有一些不容忽視的缺點，奧澤雷的書代表了西方佛教發現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此書的出版，是在歐洲最早的印度學和漢學的學術席位在巴黎出現三年後，略早於歐洲有組織的佛教文獻學術研究；奧澤雷的書代表著一個分水嶺，這表現在如下幾點：他運用的是圖像和外交人員或旅居亞洲的歐洲人遊記，而不是傳教士的文學；他堅信歷史上只有一個佛教創始人；他不願陷入語源和神話的偏偏浮想；他堅持佛教是東方乃至整個世界最大的宗教。儘管這本書並沒有在整個歐洲得到廣泛傳閱，但對佛教感興趣的知識份子，比如哲學家亞瑟·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歐洲第一位漢學教授雷慕沙（Abel-Rémusat）和語言學家朱利葉斯·克拉普羅特（Julius Klaproth）等人都讀過這本書。今天的讀者或許會發現，奧澤雷十九世紀對於亞洲最大宗教較早的粗略認識還重在描繪民間佛教的信仰和實踐方面，但該書所提供的圖景，要比今天大多數流行讀物中普遍的、有些哲學化的佛教圖景更符合亞洲活生生的佛教。

### 十一、奧澤雷關於亞洲和亞洲宗教的主要參考文獻

Anon. *Tableau historique de l'Inde contenant un abrégé de la mythologie & des mœurs indiennes. Avec une Description de leur Politique, de leur Religion, &c.* Bouillon: Société typographique, 1771.

Barrow, John. *Voyage à la Cochinchine.* Translated by Conrad Malte-Brun. Paris: F. Buisson, 1807.

Bogle, George, Samuel Turner, António de Andrade, and Pourunguir. *Voyages au Thibet, faits en 1625 et 1626, par le père d'Andrada, et en 1774, 1784 et 1785 par Bogle, Turner et Pourunguir.* Paris: Hautbout l'Ainé, 1795.

Brucker, Johann Jacob. *Historia critica philosophiae.* Leipzig: Christoph Bre-

itkopf, 1742–1744.

Chambers, William. “Some Account of the Sculptures and Ruins at Mavalipuram.” *Asiatick Researches* 1 (1788): 145–70.

\_\_\_\_\_. *Relation de l’ambassade anglaise envoyée en 1795 dans le royaume d’Ava ou l’empire des Birmans. Suivi d’un Voyage fait, en 1798, à Colombo, dans l’Île de Ceylan, et à la Baie de Da Lagoa, sur la côte orientale de l’Afrique; et de la Description de l’Île de Carnicobar et des ruines de Mavalipouram.* Edited by Michael Symes, 234–72. Paris: F. Buisson, 1800.

Conwa. (Courcy, Marquis de?). *Tableau religieux et politique de l’Indostan, ou Précis historique des révolutions de l’Inde [...] par Mr C\*\*\*, lieutenant général des armées françaises, gouverneur général de l’Ile de France, ayant commandé dans l’Inde. Publié et enrichi de notes par A. B. de B\*\*\*\*\*, auteur de l’Examen du Discours de M. Necker, à l’ouverture des états généraux, d’une Lettre à M. Pitt, de la traduction des ouvrages de M. Burke, des Vérités à ceux qui les aiment, etc., et de beaucoup d’autres ouvrages politiques.* Paris: Marchant, 1803.

d’Antermony, John Bell. *Voyages depuis St. Petersburg en Russie, dans diverses contrées de l’Asie.* Vol. 3. Paris: Robin, 1766.

de Guignes, Chrétien-Louis-Joseph. *Observations sur le voyage de M. Barrow à la Chine, en 1794.* Paris: Dentu, 1809.

\_\_\_\_\_. *Voyages à Peking, Manille et l’Île de France faits dans l’intervalle des années 1784 à 1801.*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 1808.

de la Flotte. *Essais historiques sur l’Inde: précédés d’un journal de voyages et une descriptions géographique de la côte de Coromandel.* Paris: Herissant & fils, 1769.

Giorgi, Antonio Agostino. *Alphabetum Tibetanum missionum apostolicarum commodo editum: praemissa est disquisitio qua de vario litterarum ac regionis nomine, gentis origine moribus, superstitione, ac Manichaeismo fuse disseritur: Beausobrii calumniae in sanctum Augustinum, aliosque ecclesiae patres refutantur*. Rom: Sacra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 1762.

Halde, Jean-Baptiste du, S.J.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La Haye: Henri Scheurleer, 1736.

Holwell, John Zephaniah. *Événemens historiques intéressans, relatifs Aux Provinces de Bengale, et à l'Empire de l'Indostan. On y a joint La Mythologie, la Cosmogonie, les Fêtes & les Jeûnes des Gentous qui suivent le Shastah, & une Dissertation sur la Métempsychose, dont on attribue faussement le Dogme à Pythagore*. 2 vols. Amsterdam: Arkstee & Merkus, 1768.

Jones, William. "Sur la chronologie des Hindous." *Recherches Asiatiques* 2, (1805): 164–97.

Jones, William et al. *Lettres philosophiques et historiques à Mylord S\*\*\*: sur l'état moral et politique de l'Inde, des Indous et de quelques autres principaux peuples de l'Asie, au commencement du dix-neuvième siècle, traduites, très grande partie, des "Asiatic Researches", des "Worcks of William Jones" et d'autres ouvrages anglais*. Paris: Ch. Pougens, 1803.

\_\_\_\_\_. *Recherches Asiatiques, ou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établie au Bengale pour faire des recherches sur l'histoire et les antiquités, les arts, les sciences et la littérature de l'Asie*. Translated by A. LaBaume. Edited

- by Louis Mathieu Langlès. 2 vol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805.
- Kaempfer, Engelbert. *Histoire naturelle, civile et ecclésiastique de l'Empire du Japon*. Translated by François Naude. 2 vols. The Hague: P. Gosse & J. Neaulme, 1729.
- \_\_\_\_\_. *Histoire naturelle, civile et ecclésiastique de l'Empire du Japon*. Translated by François Naude. 3 vols. Amsterdam: Herman Uitwere, 1732.
- Knox, Robert. *Relation ou Voyage de l'Île de Ceylon, dans les Indes Orientales*. Amsterdam, 1693.
- Le Gobien, Charles, S. J. (ed.).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par quelques missionnair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Paris: N. Le Clerc, 1717–1776.
- Lecomte, Louis Daniel. *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3 vols. Paris: Jean Anisson, 1696.
- Loubère, Simon de la. *Du Royaume de Siam*. 2 vols. Amsterdam: Abraham Wolfgang, 1691.
- Missions étrangères (ed.). *Lettre de Messieur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au Pape sur les idolatries et les superstitions chinoises*. Paris/Cologne, 1700.
- Montanus, Arnoldus (Arnoldus van Bergen). *Ambassades de la compagnie Hollandoise des Indes d'Orient vers l'Empereur du Japon, divisées en trois parties*. 3 vols. Leiden: Henry Drummond, 1686. Several reprints under other titles, for example *Ambassades mémorables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 Orientales des Provinces Unies vers les empereurs du Japon* (Amsterdam: Jacob de Meurs, 1680), and *Ambassades de la Compagnie Hollandaise des Indes d'Orient, vers l'Empereur du Japon*

*divisées en trois parties; ornées de figures en taille-douce. Avec une relation exacte des guerres civiles de ce pays-là* (Paris: Pierre Witte, 1722).

Montmignon, Jean Baptiste (ed.). *Choix des lettres édifiant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Paris: Maradan, 1808.

Pallas, Peter Simon. *Voyages de M. P. S. Pallas, en différentes provinces de l'empire de Russie, et dans l'Asie septentrionale, traduits de l'allemand, par M. Gauthier de la Peyronie, Commi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5 vols. and 1 vol. of illustrations. Paris: Maradan, 1788–1793.

\_\_\_\_\_. *Sammlungen historischer Nachrichten über die mongolischen Vlkerschaften*. vol. 2. St. Petersburg: Kaiserli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801.

Paulinus a Sancto Bartholomaeo (Philipp Wesdin), Johann Reinhold Forster, Abraham Hyacinthe Anquetil-Duperron, and A. I. Silvestre de Sacy. *Voyage aux Indes Orientales*. Translated by Marchéna. 3 vols. Paris: Tourneisen fils, 1808.

Pauw, Cornelius de. *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sur les égyptiens et les Chinois*. 2 vols. Berlin: G. J. Decker, 1773–1774.

Renaudot, Eusèbe. *Anciennes Relations des Indes et de la Chine. De deux voyageurs Mahometans, qui y allerent dans le neuvième siecle; traduites d'arabe: avec des Remarques sur les principaux endroits de ces Relations*. Paris: Jean-Baptiste Coignard, 1718.

Rennel, James. *Description historique et géographique de l'Indostan*. Translated by J. Castéra. Vol. 3. Paris: Poignée, 1800.

Ribeiro, João. *Histoire de l'isle de Ceylan, Écrite par le Capitaine Jean Ribeyro, & présentée au Roy de Portugal en 1685*. Trevoux: Estienne

Ganeau, 1701.

Richard, Jérôme. *Histoire naturelle, civile et politique du Tonquin*. Paris: Moutard, 1778.

Sonnerat, Pierre. *Voyage aux Indes orientales et à la Chine*. Paris: Chez l'auteur, 1782.

Symes, Michel. *Relation de l'ambassade anglaise envoyée en 1795 dans le royaume d'Ava ou l'empire des Birmans. Suivi d'un Voyage fait, en 1798, à Colombo, dans l'île de Ceylan, et à la Baie de Da Lagoa, sur la côte orientale de l'Afrique; - de la Description de l'île de Carnicobar et des ruines de Mavalipouram. Collection de Planches*. Translated by J. Castéra. 3 vols. Paris: F. Buisson, 1800.

Tachard, Guy. *Voyage de Siam des Pères Jesuites, Envoyez par le Roy aux Indes & à la Chine*. Paris: Arnould Seneuze & Daniel Horthemels, 1686.

Taylor, John. *Voyage dans l'Inde, au travers du grand désert, par Alep, Antioche, et Bassora*.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L. de Grandpré. 2 vols. Paris: Marchant, 1803.

Thunberg, Carl Peter. *Voyages de C.P. Thunberg, au Japon, par le Cap de Bonne-Espérance, les Isles de la Sonde, &c.* Paris: Benoît Dandré, 1796.

Turner, Samuel. *Ambassade au Thibet et au Bhoutan, contenant des Détails très-curieux sur les Mœurs, la Religion, les Productions et le Commerce du Thibet, du Bhoutan et des états voisins; et une Notice sur les événemens qui s'y sont passés jusqu'en 1793. Traduit de l'Anglais avec des notes, par J. Castéra. Avec une Collection de 15 Planches, dessinées sur les lieux, et gravées en taille-douce par Tardieu l'aîné*. Translated by J. Castéra. Paris: F. Buisson, 1800.



Turpin, François-Henri. *Histoire civile et naturelle du royaume de Siam, et des Révolutions qui ont bouleversé cet Empire jusqu'en 1770. Sur des Manuscrits qui lui ont été communiqués par M. l'Évêque de Tabraca, Vicaire Apostolique de Siam, & autres Missionnaires de ce Royaume.* Paris: Costard, 1771.

Valentia, George. *Voyages dans l'Hindoustan, à Ceylan, sur les deux côtes de la Mer Rouge, en Abyssinie et en égypte durant les années 1802, 1803, 1804, 1805 et 1806.* Translated by Pierre François Henry. Vol. 1. Paris: Lepelet, 1813.

### 參考文獻

App, Urs. "William Jones's Ancient Theology." *Sino-Platonic Papers* 191 (2009): 1–125.

\_\_\_\_\_. *The Birth of Oriental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0.

\_\_\_\_\_. *The Cult of Emptiness.* Wil: University Media, 2012.

Bernard, Jean Frédéric. *Cérémonies et coutumes religieuses des peuples idolâtres. Illustrated by Bernard Picart.* volume 2. Amsterdam: Chez J. F. Bernard, 1728.

Chambers, William. "Some Account of the Sculptures and Ruins at Mavalipuram." *Asiatick Researches* 1 (1788): 145–70.

Faber, George Stanley. *The Origin of Pagan Idolatry Ascertained from Historical Testimony and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3 volumes. London: F. & C. Rivingtons, 1816.

Görres, Joseph. *Mythengeschichte der asiatischen Welt.* 2 volumes. Heidel-

berg: Mohr und Zimmermann, 1810.

Jones, William. “Sur la chronologie des Hindous.” *Recherches Asiatiques* 2 (1805): 164–97.

Kaempfer, Engelbert. *Histoire naturelle, civile et ecclésiastique de l’Empire du Japon*. Translated by François Naude. 2 volumes. The Hague: P. Gosse & J. Neaulme, 1729.

\_\_\_\_\_. *Histoire naturelle, civile et ecclésiastique de l’Empire du Japon*. Translated by François Naude. 3 volumes. Amsterdam: Herman Uitwewere, 1732.

La Loubère, Simon de la. *Du Royaume de Siam*. 2 volumes. Amsterdam: Abraham Wolfgang, 1691.

Masuzawa, Tomoko. *The Invention of World Religions*.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Pallas, Peter Simon. *Voyages de M. P. S. Pallas, en différentes provinces de l’empire de Russie, et dans l’Asie septentrionale, traduits de l’allemand, par M. Gauthier de la Peyronie, Commi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5 volumes and 1 volume of illustrations. Paris: Maradan, 1788–1793.

Ozeray, Michel-Jean-François. *Recherches sur Buddou ou Bouddou, Instituteur Religieux Del’ Asie Orentale*. Paris: Chez Brunot-Labbe, 1817.

Pignoria, Lorenzo, Vincenzo Cartari, and Cesare Malfatti. *Le vere e nove immagini de gli dei delli antichi: cauate da’ marmi, bronzi, medaglie, gioie con esquisito studio*. Padoua: Pietro Paolo Tozzi, 1615.

Ritter, Carl. *Die Vorhalle europäischer Völkergeschichten vor Herodotus, um den Kaukasus und an den Gestaden des Pontus*. Berlin: G. Reimer, 1820.

Roux. *Nécrologie. M.-J.-F. Ozeray*. Chartres: Garnier, 1860.

Symes, Michael. *Relation de l'ambassade anglaise envoyée en 1795 dans le royaume d'Ava ou l'empire des Birmans. Suivi d'u Voyage fait, en 1798, à Colombo, dans l'île de Ceylan, et à la Baie de Da Lagoa, sur la côte orientale de l'Afrique; - de la Description de l'île de Carnicobar et des ruines de Mavalipouram. Collection de Planches.* Translated by J. Castéra. 3 volumes. Paris: F. Buisson, 1800.

Thunberg, Carl Peter. *Voyages de C.P. Thunberg, au Japon, par le Cap de Bonne-Espérance, les Isles de la Sonde, &c.* Paris: Benoît Dandré, 1796.

Valentia, George. *Voyages dans l'Hindoustan, à Ceylan, sur les deux côtes de la Mer-Rouge, en Abyssinie et en Égypte durant les années 1802, 1803, 1804, 1805 et 1806.* Translated by P.-F. Henry. Volume 1. Paris: Mme Vve Lepetit, 1813.

(李巍譯)